

冼星海与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歌咏活动

付冬生¹

(1.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2.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要:抗战期间少年儿童抗日团体风起云涌,其中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之一的“孩子剧团”宣传活动卓越,受到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革命领导人和文化名人的关心,这其中就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孩子剧团”是抗战期间冼星海帮助最多的少年儿童抗日团体,他与“孩子剧团”的交集主要发生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他曾多次教授“孩子剧团”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指导“孩子剧团”参加演出和开展歌咏活动,还为“孩子剧团”团员走上艺术道路提供帮助等。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影响助推了“孩子剧团”后期的发展壮大。

关键词:冼星海;抗战时期;“孩子剧团”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3-0026-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304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临青学校的一部分学生和山海工学团学员到恩派亚戏院的难民收容所避难。他们亲历了日军的烧杀抢掠与无恶不作,“不甘心当亡国奴,迫切要求能继续参加热火朝天的救亡运动,为神圣的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力量。”^[1]9月3日,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22名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难童在难民收容所创立了上海首个儿童抗日团体——“孩子剧团”。9月11日《救亡日报》刊登了《孩子剧团宣言》:“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好的工作来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2]“孩子剧团”成立后通过演戏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用歌声去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成为中共抗战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38年4月,在周恩来与郭沫若的帮助下,军委会第三厅当局对其进行收编。这时,田汉为六处处长,洪深为六处下设戏剧音乐科科长,冼星海任主任科员并负责音乐宣传工作。因抗战期间“孩子剧团”影响日隆且表现卓越,受到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人的格外关注。此外,老舍、茅盾、冯玉祥等名人也常常帮助“孩子剧团”,这其中还有音乐家冼星海。

冼星海的音乐实践活动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学生时期(1918—1934);救亡歌咏运动时期(1935—1938);延安时期(1938—1940)^[3]。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工作的冼星海指导并推动了“孩子剧团”在武汉的全部歌咏活动,此时正处于救亡歌咏运动时期(1935—1938)。这一时期“音乐为抗战服务”“音乐活动中重视组织、教育作用”“音乐大众化问题”及“歌咏活动是有力斗争方式”等观念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冼星海音乐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虽然冼星海在武汉只生活了一年,

收稿日期:2019-03-10

作者简介:付冬生(1977—)男,河南信阳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抗战文学及儿童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抗战大后方重庆‘孩子剧团’研究”(2016YBW075);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专项研究项目“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与‘孩子剧团’研究”(GY2018B02);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抗战大后方少儿文艺团体研究”(2019年度)。

但这在其艺术生涯中却是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在武汉建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吸纳“孩子剧团”人会并数次邀请、指导其演出,教授“孩子剧团”学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爱国革命歌曲。他的音乐思想对“孩子剧团”的价值取向与艺术道路选择起到一定的影响。在冼星海的指导和帮助下,“孩子剧团”的演出效果与社会反响与日俱增,对抗战文艺尤其是戏剧演出的繁荣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为“孩子剧团”之后开展抗战音乐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歌咏成为“孩子剧团”抗日文艺宣传的重要武器

我们知道,音乐是最易于直接与群众接触并为大众接受的、具有感染力的救亡图存的宣传手段。抗战爆发后,音乐界进步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以歌咏等为武器来唤醒民众。在冼星海、盛家伦、贺绿汀等人的推动下抗战音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冼星海的功绩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他对少年儿童抗战文艺团体的关注。

冼星海与“孩子剧团”的交集主要集中在武汉歌咏运动时期,但最早可追溯到1935年的山海工学团。剧团最初由上海临青学校的“孩子歌咏队”队员和山海工学团学员组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演剧二队。其间,他经常去山海工学团教团员们学唱歌。一听说冼星海要来教唱救亡歌曲,山海工学团总团及分团的学员们十分开心,全然不顾山海工学团周边有保安队、宪警的严密监视,都从周边赶来跟着冼星海学唱歌曲。得知此消息的工人、学生和店员等也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甘愿冒着危险纷纷前来听冼星海教歌”。据山海工学团学员许翰如回忆:“1937年春夏之间的一天,他(冼星海)从上海市区来到远郊区大场山海工学团教我们唱歌。”^[4]关于冼星海教唱歌细节,许翰如这样回忆:“冼星海指着歌谱教一句,大家就唱一句,他一句句往下教,大家就一句句跟着唱下去,一遍、两遍、三遍……”。冼星海要求“大家从头到尾连起来唱几遍,要看指挥,注意感情的表述……”^[4]。由于冼星海教学认真且有耐心,大家一会就会了。按照时间来分析,冼星海在教授山海工学团唱歌时,被称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5]61}之一的“孩子剧团”还尚未成立,但其早期团员已接受冼星海艺术上的指导,正是因为冼星海早期的音乐熏陶使得歌咏成为“孩子剧团”抗日文艺宣传的一个重要武器和表现形式。

冼星海在武汉明确提出“音乐为抗战服务”的指导思想,他指出音乐在抗战中“负起了抗日的伟大任务”^{[6]25}。他还突出强调了音乐在抗战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大作用和现实意义。他意识到“救亡音乐在抗战的文化阵线里是一道铁的支流”,往往比戏剧、美术等文艺形式更加直接有效。对于如何发挥救亡音乐的作用,他要求“利用救亡音乐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的在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6]24-25}。他还为抗战救亡运动中音乐的发展指明方向:“组织民众和激发民众抗敌力量”“唤起不愿作奴隶者的内心的斗争热情”,最终“完成民族救亡伟大任务”^{[6]24-25}。冼星海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新兴音乐的缺陷“永远停留在散漫的状况里”“没有很好的组织和教育”,因为“组织与教育”问题,是新兴音乐最实际的事。他提出要实现音乐为抗战服务,必须要高度重视组织领导与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其实质就是“根据音乐的发展和需要建立起一支新的音乐文化队伍的问题,只有形成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目标一致、有组织的新生力军,才能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7]。冼星海认为组织教育工作的意义在于培养音乐人才,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与实现新音乐理想,只有“把全国音乐界原有力量集中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斗,才能实现新音乐的美学理想”^[7]。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其中,少年儿童抗战文艺团体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利用歌咏这种最方便普及的艺术形式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尤其重视各级学校的音乐教育和抗日宣传活动,歌咏活动以各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为主要宣传力量,这些单纯集中的表演深受民众的喜爱。作为音乐活动家的冼星海也深知这一道理。1938年1月,以武汉为核心的抗战歌咏运动轰轰烈烈地举行。冼星海敏锐地察觉到武汉和全国

众多的抗战歌咏团体联络不紧密,这直接导致武汉的抗战歌咏活动不能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地开展。在此期间,他还清醒地认识到建立“音乐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作用。为配合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需要,冼星海联合刘雪庵、张曙等倡议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他非常重视“音乐为抗战服务”“音乐活动的组织领导”等问题,虽然他在武汉只呆了一年,然而,他前后发起成立了60余个歌唱团体,组织参与并领导了所有的歌唱大会。他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武汉的歌咏团体团结起来,建立了“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目标一致、有组织的新生力军”。其中,“中华全国歌咏协会”规模最大。据统计,当时登记参加“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的团体有三百多个,“孩子剧团”是其中之一。“孩子剧团”被“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吸纳具有特殊的意义,标志着抗战爆发后“孩子剧团”流浪的终结,找到组织并得到专业的艺术指导,这也是“孩子剧团”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随后,“孩子剧团”多次参加歌咏协会举办的演出活动并获得广泛好评。这对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助长民族志气,鼓舞动员少年儿童参加抗战,扩大抗战国际影响,争取国际同情及援助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冼星海给“孩子剧团”专业、系统的艺术指导

“孩子剧团”团员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求知欲望,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并不是为演戏而来,而是为了救国,为了讨论我们小朋友应该怎样来救国的。”^[8]这些团员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演出能力先天不足,想演好一部戏举步维艰且困难重重。冼星海带领刘雪庵、张曙等音乐家给“孩子剧团”专业、系统的艺术指导。在指导剧团演出时,他们既考虑到“抗战文艺作品需要短小精悍、富有鼓动性的特点,又注意了它在演出中容易出现单调、松懈、衔接不紧的毛病”^[9]。因此在彩排中,冼星海注意着力提高节目的表演技巧,并把不同形式的节目穿插在其中演出。这样,既调节了观众的观看情绪,也让观众觉得节目紧凑活泼,且保持了演出现场的热烈气氛,还便于不同层次的观众去理解节目的内容,进一步达到了向群众宣传抗战的目的。

“孩子剧团”加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后,以冼星海为代表的音乐家们不仅帮助“孩子剧团”提高艺术水平和演出效果,还帮助他们创新大众文艺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孩子剧团”的演出也充分展示出文艺轻骑兵的巨大战斗力量。在冼星海亲自指导和帮助下,“孩子剧团”逐步意识到演出不仅是宣传救亡意识的利器,还是唤醒民众的有效工具。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演出把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传播到群众中去,“进而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结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抗日大军,去击溃日寇的侵略。”^[9]“孩子剧团”历尽艰辛排除万难,用歌声来号召民众、鼓舞革命、保卫国家、粉碎敌寇、夺取胜利。据统计,抗战期间“孩子剧团”经常演唱的爱国歌曲有80多首,其中《在太行山上》《救国军歌》《保卫黄河》等冼星海创作的歌曲就有10余首之多。“孩子剧团”也以“阳刚之气或婉转抒情的歌声”^[10]去唤醒广大民众,激发起他们的抗日情绪、爱国之心,共赴国难。这正是冼星海所倡导的“要利用歌咏的宣传力量,在抗战中发扬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全国同胞的爱国热情”^{[6]86}。

在武汉和“三厅”时期,冼星海对“普遍音乐”的实践与探索渐趋成熟,他明确提出了“音乐大众化”的问题,指出:歌咏运动本来就是民众的“歌运”“要通透各阶级”“尤其是工农阶级”,从“底层”,从“乡村”开展^{[6]24-25}。此外,冼星海还在文章中谈到歌唱水准高低不均衡等问题。他认为歌咏运动最大的阻碍是“水准太高或太低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我们要利用“歌咏宣传现实的政治的环境”。他提出甚至可以用“民谣、说书、朗诵、舞蹈来助成歌运”^{[6]26}。冼星海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为艺术而艺术”和只重视审美性而忽视时代性曲高和寡的歌咏活动。同时,他还指出如何解决歌咏水准过低的建议——用简单的办法来展现。于是,他积极发起歌咏大会、抗战歌咏集会、歌咏比赛等喜闻乐见、简单易行的艺术演出来解决歌咏水准太低的现实问题。同样,歌咏也是少年儿童抗日团体等宣传抗日的重要形式。可以说,武汉歌咏运动时期也是冼星海这一音乐教育思想的重要实践期。1938年1月17日,冼星海在武汉光明戏院发起创立“中华全国歌咏大会”。其中,“有三百余名歌咏队员参加,冼星海担任主席”^[11]。当日下

午,团员们声情并茂地演唱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多首爱国歌曲。当第二首歌曲演唱结束时,观众情绪激烈,纷纷拍手要求再唱。于是,“孩子剧团”团员们连续又唱了五首歌曲才走下舞台。此次成功演出给“孩子剧团”极大的精神鼓舞,也让孩子们认识到自己在抗战宣传运动中的作用与意义,当然这一切得益于冼星海帮助。第二天,武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中华全国歌咏大会”的消息并盛赞“孩子剧团”的演出,这也是“孩子剧团”成立以来首次参加大型演出,并得到观众和社会的认可。《孩子剧团团歌》作者郭映艇回忆:“原来规定‘孩子剧团’演唱三支歌,群众热烈鼓掌,加唱了一支。但唱完后群众仍鼓掌不息,要求再唱,负责会场的同志一再摆手也无法控制群众欢呼的浪潮,大会主持人冼星海同志立刻走出台前毅然决定:‘让他们唱下去!’这样又唱了一支歌曲,‘孩子剧团’才在一片狂热的掌声中走下台去。”^{[5]68}团员陈模也回忆:当冼星海宣布“现在由‘孩子剧团’唱歌时,听众中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不少听众高兴得叫了起来:‘好!再来一个!’接着,我们唱了《流浪儿》和《大刀进行曲》,赢得更加持久的掌声。规定每队只唱三支歌,但观众热烈鼓掌挽留我们,冼星海便要求我们再唱一支。我们唱了《八百壮士歌》,观众又鼓掌要我们再唱,冼星海只得让我们再唱了一支歌。我们唱歌时,冼星海在台下静静地听着。我们一唱完,他就跑到后台来,激动地对我们说:‘孩子们,你们毕竟是战区来的,唱得很有激情,整齐、雄壮、有力,很感人!我听得要流泪了。你们以后还要加油呀!’他又对小指挥徐晴说:‘你指挥得不错,灵活有力。动作嘛,还可以再大一些。’大家听了,受到很大的鼓舞。”^[12]虽然“孩子剧团”成员对“中华全国歌咏大会”的回忆稍有出入,但大家对冼星海大力推进歌咏运动都记忆犹新。“孩子剧团”积极参加冼星海组织的歌咏大会、抗战歌咏集会等活动,不仅体现了冼星海“音乐大众化”的观念,也充分印证其“鼓舞民众、启发民众教育”的音乐教育理念的形成。冼星海用实际行动给“孩子剧团”以艺术指导和价值引领,这对以后“孩子剧团”在艺术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1938年也是“孩子剧团”发展的成熟期,这一年受益于冼星海等音乐家对他们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这一年也是冼星海通过帮助“孩子剧团”来践行其“音乐为抗战服务”、音乐要“重视组织和教育”等音乐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对“孩子剧团”的艺术观念、表演技巧、形式创新、发展道路等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

三、冼星海教授“孩子剧团”学唱《游击军》等歌曲

冼星海认为:抗日歌咏运动应该是普罗大众的“歌运”,“歌咏更应去广阔的天地——乡村发挥更大的作用。”^{[6]204}冼星海除了深入城市、乡村、工厂和学校等地指挥演唱、参加演出外,还给人民大众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同时,他还四处奔走,亲自组织指挥“底层”群众开展歌咏活动,教授“孩子剧团”成员学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歌咏运动应是大众的‘歌运’”必须要通透各阶级,“从‘底层’,从‘乡村’开展”的音乐教育思想。这一点在“孩子剧团”团员的相关文章中有所论及。

郭映艇谈到:“群众歌咏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冼星海就专程赶到‘孩子剧团’的驻地来了,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他要求我们专门为他唱一次《团歌》,他听得很仔细,表示很满意,并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如歌曲结尾重复部分第二次演出时节奏要慢一些,收尾要坚强有力,‘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那一句‘新世界’三字要唱出最强音,我们遵照冼星海同志的意见,在演出乐曲处理上做了改进,收到了更好的效果。”^{[5]68}冼星海指导“孩子剧团”唱歌的过程也是零距离艺术指导的过程,许翰如在《冼星海教我们唱歌》一文中记载:“孩子听说冼星海也在武汉,就派人请他来教歌,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随后,冼星海按照约定如期来到“孩子剧团”的驻地,教“孩子剧团”唱《祖国的孩子们》和《游击军》歌曲。“大家蜂拥在他的身边”跟他学唱歌。关于教唱歌的情景,许翰如回忆道:“冼星海一句句地教,一遍遍地教,我们就一句句地学,一遍遍地唱。”虽然团员们从未接受过专业的艺术训练,音乐水准欠佳,短时间难以提高,但冼星海仍然“以极大的热诚和耐心一字一句地教下去”。“不久,冼星海又来到我团,教我们唱他新创作的歌曲《赞美新中国》(光未然词)。”^{[13]9}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冼星海在“孩子剧团”艺

术指导方面功不可没。

在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中,他一直倡导把歌咏当作斗争的武器,号召“用歌咏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把他们唱上战场”。为了践行这一音乐思想,冼星海每次谱写完一首歌曲都要坚持试唱,试唱的过程其实也是组织、发动民众的过程。1938年,他谱写了爱国歌曲《太行山上》,在试唱之际他首先想到“孩子剧团”。据团员胡杰回忆:“冼星海拿着歌谱对我们说,这个曲子,请你们试唱吧。我们很快地选好了十几个男、女团员。由冼星海先生教唱,学了一两遍大家就学会了。”“一天下午,就在宿舍前空地上,正式演唱。冼星海、林路、张曙都来了,冼星海亲自指挥,唱完了很满意,大家也很高兴,他激动地握着我们每个演唱小朋友的手,表示感谢。”^{[5]48-49}从此《太行山下》伴随“孩子剧团”从武汉到湖南、广西、贵州,并回荡在祖国碧水青山间。冼星海不断地让“孩子剧团”试唱其谱写歌曲的过程,既是自己的创作实践不断探索与升华的过程,更是一次艺术指导与演唱示范,还是一次促进民众觉醒和增强抗战意识的过程。不仅提升了“孩子剧团”的歌唱技巧、情感表达和艺术表现力,也是冼星海在武汉的歌咏运动时期音乐教育思想形成、发展、实践和传播的过程。

四、冼星海着力扶持和培养“孩子剧团”音乐新人

冼星海发现武汉的歌咏运动发展迅速,但会教唱歌和指挥的干部又太少,仅靠个人和军委会第三厅音乐工作者的力量非常有限。为了更好地发挥歌咏的宣传力量,创作适应大众需要的作品,冼星海开始重视并着力扶持、培养音乐新人。“孩子剧团”团员、音乐指挥家严良堃和作曲家郭映艇等就是其中之一。最初在严良堃的眼里,他认为指挥就是举着指挥棒随着音乐的节奏打拍子罢了。但是冼星海的指挥表演让他震惊:“一只手向上舞动着,口中跟着音乐一起念念有词,身体不时前倾,全部情感投入指挥,指挥跟着音乐抑扬顿挫,游心于艺,心神合一。”^{[14]36}“原来指挥还可以这样精彩!还能够激发听众的情绪!”^{[14]36}从这一刻起,音乐指挥对于严良堃而言意义重大、内涵全新。在学习指挥时,冼星海这样教诲学生:“指挥基本功一定要过硬,技巧都要准确、扎实、到位。”^{[14]36}这些话不仅变成他的学习信条,也成为他一辈子的座右铭。严良堃回忆冼星海亲自指导情景:“你的基本功一定要扎实,要把手的每个关节都练习得很灵活,但上台不要卖弄,不要表现音乐之外的东西。”^{[14]36}严良堃于1938年加入“孩子剧团”,后在冼星海的培养下,他的指挥细腻严谨,乐风含蓄抒情,动作潇洒洗炼。1940年,“孩子剧团”在渝演出《黄河大合唱》,其中仅17岁的严良堃首次担任总指挥,反响热烈,此次演出也开启了他的指挥生涯。若干年后,严良堃成为国内专业合唱事业的奠基人和非常杰出的合唱指挥艺术家。

除了教唱歌技巧外,冼星海还给“孩子剧团”全方位的艺术指导。如教授指挥方法,其中包括几种常见的二拍子、三拍子和四拍子打法,剧团成员在冼星海的帮助下逐步学会了演唱技巧、情感表达和指挥方法。冼星海亲自示范教学,他教授的歌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祖国的孩子们》和《救国军歌》。在教学中冼星海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先请学员示范,随后他再对起拍、结束、强弱、姿势等问题进行纠正。学员们评价他的教学轻松、明了、易学,终身难忘。“孩子剧团”团长许翰如谈到:“冼星海也常来教我们唱歌,学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和好些抗战歌的情景我至今难忘”。他指出,孩子剧团的演唱水平是得到公认的,“这得益于星海先生的训练”^[15]。随后,在三厅郭沫若厅长和音乐老师冼星海等的精心指导下,“孩子剧团”迅速壮大,成长为一支杰出的宣传武装力量。

冼星海提出“音乐要为抗战服务。强调音乐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负起了抗日的伟大任务。”^[16]武汉歌咏运动时期,冼星海逐渐认识到开展歌咏活动是当时一种非常有力的斗争方式,因为文艺从来都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总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冼星海指出歌声“她是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敏锐的武器”“可以保护国土、唤醒民众,而且还可以粉碎敌人!”^{[6]25}在冼星海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孩子剧团”在进行民族救亡、抗击日本侵略运动的宣传中,特别注重用音乐的形式——演唱爱国歌曲的方式来敲响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战鼓。“孩子剧团”开展的抗战歌咏活动有声有色,成为抗战音乐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还丰富了抗日军民的精神生活,促进了大后方抗战歌咏活动的开展,成效显著,而且拥有非常强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这对激励和教育民众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1938年夏,武汉形势急剧恶化。政治部第三厅负责疏散在武汉开展抗战宣传的工作人员,并对其组织工作重新调整。于是,众多的文化工作者被收编,有了正式国家编制。之后,政治部第三厅重新组合建立了十支抗敌演剧队、四支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重建后的这些宣传队伍被陆续派往前线和内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武汉县华林第三厅的冼星海、张曙和赵启海“主持了歌咏人员的报名、考试和录取工作”。随后,考试通过被录取的人员则由“三厅变为‘抗敌演剧九队’(队长徐桑楚)进行集训”^[17]。其间,冼星海的音乐教育实践对“孩子剧团”的指导帮助极大,不仅鼓舞了“孩子剧团”的革命热情,而且在唤醒民众、激励斗志、凝聚民族精神,推动音乐宣传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随后的培训和演出中,“孩子剧团”团员不仅以生动出色的演出来反映抗战现实,激发前方官兵的士气和广大群众的爱国激情,而且还培育出一批非常优秀的少年文艺工作者。1939年1月“孩子剧团”转移重庆。随后,剧团在渝用文艺的方式对敌作战,开展了一系列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和宣传民主的公演活动。1942年夏“孩子剧团”处境每况愈下。9月,在冯乃超同志的指挥和安排下,团员们有序地疏散转移。与此同时,为了孩子们的前途,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后,根据特长和年龄对“孩子剧团”分批做出安排:一部分团员被输送到苏区延安;一部分团员考入国立戏剧学校或音乐学校继续学习。很多孩子由此走上了艺术事业的道路,逐步成长为音乐、戏剧、舞蹈等文艺工作者。这些孩子的成长道路与冼星海在武汉歌咏运动期间的艺术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冼星海对“孩子剧团”的帮助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冼星海以专业教师的身份对“孩子剧团”提供了专业性的艺术指导,教授团员唱歌、指挥和作曲。他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唱歌也是抗日救亡!”他的艺术教育思想影响并助推了“孩子剧团”后期的发展壮大。二是冼星海对“孩子剧团”的言传身教,亲自指导,为大后方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有力推动了大后方革命艺术活动的发展。“孩子剧团”成员、著名指挥家严良堃和作曲家郭映艇等都是冼星海培养的杰出学生。三是冼星海为“孩子剧团”团员日后走上艺术道路提供无私帮助。苏扬、于真、周令芳、蔡侗、周令章等就是在冼星海的影响和帮助下走上艺术的康庄大道。

抗战时期,歌咏活动和戏剧一样发展迅速,也成为抗战音乐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歌咏活动大多和中小学校的学生结合,成为群众抗日救亡的一种最佳的宣传方式,极大的焕发了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这其中以“孩子剧团”的音乐歌咏活动影响最为广泛,其歌咏活动在武汉及大后方重庆都起到了表率作用。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更与冼星海的艺术指导密不可分。1942年9月,“孩子剧团”宣告解散。“短短五年,剧团行程两万多里,途经8个省市,演出了30部戏剧,唱响了80首抗战歌曲,演出达500场之多。”^[18]“孩子剧团”的歌咏活动不仅影响了千千万万少年儿童积极投身抗战阵营,还成为中国抗战音乐活动的重要篇章,对繁荣抗战儿童文艺尤其是儿童音乐的发展和创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周恩来用“救国、革命、创造”^[19]概括“孩子剧团”的精神,盛赞其是“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象征。”^[1]郭沫若也评价“孩子剧团”是周恩来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20]⁴⁰。茅盾则高度评价“孩子剧团”是“冲开了敌人炮火的勇敢、天真、活泼的未来的中国主人”^[21]。

[参 考 文 献]

- [1] 健行. 抗日烽火中的孩子剧团[J]. 档案与史学, 1995(4).
- [2] 孩子剧团宣言[N]. 救亡日报. 1937-09-11.
- [3] 邱晓枫. 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实践[J]. 中国音乐, 2009(3).

- [4] 许翰如. 精神不死[N]. 解放日报, 1946-10-30(6).
- [5] 四川省青运史研究会重庆分会, 共青团重庆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编. 重庆青运史研究资料——孩子剧团史料专辑[G], 1986(3-4).
- [6] 冼星海. 《大家唱》第二集序. 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M]//《冼星海全集》(1)编辑委员会.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 [7] 罗小平, 高梁. 试论冼星海的美学思想[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1985(4).
- [8] 张葑. 我们是怎样到武汉的[N]. 新华日报, 1938-01-24(3).
- [9] 廖超慧. 抗战血泊中的一朵奇花[J]. 湖北大学学报, 1986(5).
- [10] 音乐教育与创作杂志社. 孩子剧团唱过的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M]. 长沙: 音乐教育与创作杂志社, 2005.
- [11] 杨昌江. 冼星海与武汉抗战歌咏活动[J]. 人物春秋, 2000(2).
- [12] 陈模. 在孩子剧团里成长[J]. 红岩春秋, 2001(5).
- [13] 许翰如. 大海浪花——回忆孩子剧团的战斗生活[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14] 严良堃. 战火中的童年[M], 北京: 同心出版社, 1997.
- [15] 倪迅. 孩子剧团团长话当年[OL]. (2005-09-01)[2019-03-10] <http://news.sina.com.cn/o/2005-09-01/05066832137s.shtml>.
- [16] 李莉. 冼星海在武汉[J].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8(3).
- [17] 杨昌江. 冼星海与武昌抗战歌咏[J]. 武汉文史资料, 2015(4).
- [18] 李桂杰. 边走边唱两万里, 宣传抗日救亡……孩子剧团: 童心依旧[N]. 人民日报, 1997-08-13(10).
- [19] 陈慧琳. 孩子剧团欢迎会上[N]. 新华日报, 1938-02-10(2).
- [20] 郭沫若. 洪波曲[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79.
- [21] 茅盾. 记孩子剧团[N]. 少年先锋, 1938-03-05(2).

Xian Xinghai and the Singing Activities of the “Children’s Troup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u Dongsheng

(School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young children’s anti-Japanese groups were surging. Among them, the “children’s troupe” known as the three stars in Chinese children’s world was outstanding. They were concerned by revolutionary leaders and cultural celebrities like Zhou Enlai, Guo Moruo, and Mao Dun. “Children’s troupe” is the most popular child and youth anti-Japanese group in the Xian Xinghai. His intersection with the “children’s troupe” mainly took place in the Third Hall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ist Military Committee of Wuhan. He has taught “children’s troupe” to sing “guerrillas” on many occasions. Military on the Taihang Mountains and other songs guide the “children’s troup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rformance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children’s troupe” members to embark on the artistic road.

Keywords: Xian Xinghai;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children’s troupe”

[责任编辑: 左福生]